

● 胡可先 / 著

中唐

政治与文学

——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

城上高墙接大荒。

倚天犹见正元光。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冷树苍苍遮白日。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关关百越文章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中唐政治与文学

——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胡可先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81052-384-8

I. 中… II. 胡…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150 号

中唐政治与文学

——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

胡可先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劲松激光照排社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彭君华	印张	13.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310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0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52-384-8/I·3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吴熊和

9世纪初的“永贞革新”，可以说是两个半世纪之后“熙丰变法”的一次小型彩排或预演。“永贞革新”势孤力弱，匆匆收场。然而历史并不就此沉寂下来。以“永贞革新”为开端，自中唐至于北宋，力图新变就像一股潮流，一浪高于一浪地向前涌动。“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就是展现了更多革新内容的后续篇章。

在唐宋两代的变革浪潮中，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的文人，怀着图变图强的共识凝聚汇集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并为专制政体下实行某种温和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以“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来说，唐顺宗李诵因病深居幕后，王叔文、王伾以东宫旧人出入宫廷，朝中革新失败后同日被贬的“八司马”，就大都是贞元期间擢拔的新进士。柳宗元登第时才21岁，参与“永贞革新”亦仅33岁。韩愈说柳宗元入朝后，“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刘禹锡与柳宗元为同榜进士，年长一岁。他后来与韩泰回忆“永贞革新”时期群英荟萃、才高气盛的情况：“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

朝回一字行。”反映了当时这些年轻改革家凌厉无前的风概。

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是中唐政治革新的主体，同时也是中唐文学创新的主体。主体的两重性，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互渗透而又不可彼此替代的。中唐固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集中地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但中唐文学的总体成就，决不下于盛唐。柳宗元、刘禹锡诸人，以两重性主体的特殊角色进入中唐文坛，给中唐文坛的构成带来了新变化。北宋时期，既是政治“名臣”又是文学“名家”的，为数更多，蔚为风气，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主流群体。这种政治革新主体与文学创新主体两者结合的趋势，是在唐宋时期重大历史变动的背景下出现的，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特色，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唐宋两代的政治改革，不幸都以失败告终，改革者总要为肩负的历史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15年，卒于离京5000里外的柳州，年仅47岁。刘禹锡被贬24年，55岁时始得还京。他们许多优秀作品，大都作于蛮荒边远的迁谪生涯之中。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宋代的改革者，一代一代接踵而起，他们所遭遇的艰危困苦，有些还甚于唐代的先行者。然而接下来的改革者往往步子愈迈愈大，改革的志向也愈加坚定不移。唐宋历史上那些富有生气的章

节，不少是肇始于“永贞革新”的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创造的。

胡可先同志多年前与已故吴汝煜教授合作撰有《全唐诗人名考》等著作，其文史功底在年轻学者中是很突出的。他的《杜牧研究丛稿》、《唐郎官石柱题名考补正》、《登科记考补编》，亦以精审见长。近年来到杭州攻读博士学位，埋首群籍，勤奋耕耘，旁搜远绍，寒暑不辍。他在原来熟稔唐代文献的基础上，进而涉猎两宋载籍，撰有多种宋代词人年谱与有关宋词的考证著作，学术取径不断扩大。值其《中唐政治与文学》一书问世之际，聊书数语，作为对“永贞革新”等历史事件的共同纪念。

2000年5月8日于杭州

目 次

序(吴熊和).....	1
绪 论.....	1

上 编

第一章 东南文士集团参政与永贞革新主体论.....	9
第一节 永贞革新的历史背景.....	9
第二节 永贞革新的党派分野	19
第三节 陆质新学:王叔文集团政治改革的理论基础.....	72
第四节 永贞革新的过程和八司马的结局	80
第五节 永贞内禅与顺宗之死的隐秘	90
第六节 结论和推论.....	101
第二章 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	111
第一节 永贞革新:中唐前后期文学的分界线	111
第二节 牛李党争:政治旋涡中的文人命运	123
第三节 元和削藩:中兴希望给文人的鼓舞	136
第四节 甘露之变: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的交会点	141
第五节 结论和推论.....	154

第三章 永贞革新与元和新变..... 168

第一节 文学史“三元”现象的考察..... 168

第二节 元和之风尚怪..... 180

第三节 论元和体..... 188

第四节 永贞革新与南方文学的发展： 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例 201

第五节 刘禹锡《阿娇怨》诗旁证..... 218

第六节 结 论..... 234

第四章 从《永贞行》到《柳子厚墓志铭》..... 238

第一节 《永贞行》及其相关问题..... 239

第二节 《顺宗实录》的偏颇及引起的聚讼..... 247

第三节 《柳子厚墓志铭》探微..... 253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学术论争..... 265

第五节 结 论..... 276

下 编

第五章 永贞革新主要人物考..... 279

第一节 陆质考..... 279

第二节 韦执谊考..... 288

第三节 陈谏考..... 296

第四节 韩泰考..... 301

第五节 李景俭考..... 308

第六节 韩晔考..... 315

第七节 凌准考·····	317
第八节 程异考·····	322
第六章 永贞革新诗文编年·····	330
第一节 顺宗时期·····	330
第二节 宪宗时期·····	339
第三节 穆宗时期·····	372
第四节 敬宗时期·····	377
第五节 文宗时期·····	379
第七章 永贞革新史事丛考·····	388
第一节 刘、柳初贬之居地 ·····	388
第二节 吕温与窦群·····	390
第三节 柳宗元与吴武陵·····	395
第四节 李谅与牛僧孺·····	399
第五节 韩愈与宦官矛盾的一条材料·····	404
第六节 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405
第七节 元稹与永贞革新·····	407
第八节 三学士·····	412
第九节 韦筹博士·····	416
引用书目·····	417
后 记·····	428

绪 论

对于唐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没有一块土地像唐代文学那样被耕耘过千百度。无论是资料搜集、事实考订、文本分析,还是理论探讨,都在不断深入地展开。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文学的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有些现象仅从文学本身分析,反而得不出科学的结论,于是逐渐把视野扩大到与文学相关的领域,诸如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通过各学科的相互联系对文学发展作出较为科学的解释。这就是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

在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方面,我曾设想过这样一个选题:《唐代政治事件与文学研究》。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往往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都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研究这一课题就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想尝试对唐代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这些事件主要有安史之乱、永贞革新、牛李党争、元和削藩、甘露之变、黄巢起义等等。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复杂现象,某一时期作家的群体心态,乃至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都与这些政治事件有或大或小的关系。这样建立在具体事实考察基础上

进行的理论探讨,或许可以避免通常理论研究中的空疏之弊。《中唐政治与文学》就是我没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一课题以永贞革新为中心,涉及到文学、历史和政治三个层面,单从某个层面来说,学术界还是颇为注意的。在历史与政治方面,建国以后的诸多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对永贞革新提上一笔,尽管观点颇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在文学研究方面,尤其研究刘禹锡、柳宗元,永贞革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常常提到。但大多把永贞革新作为他们生活经历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把重心放在文学的发展方面。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开辟了诗文证史的新途径。他以文学证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写了《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以李复言的小说《续玄怪录》揭示唐代宫廷斗争的秘史,使得顺宗、宪宗时的某些历史悬案得到了彻底的澄清。陈寅恪以后,揭示永贞革新内幕的,主要有王芸孙、章士钊、卞孝萱三人。王芸孙写了《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一文,刊于1963年《历史研究》第3期,始对永贞革新事件进行全面翻案。章士钊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他的著作《柳文指要》中。卞孝萱的成果则散见于他的《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刘禹锡丛考》、《唐代文史丛考》等著作中。这些研究都为永贞革新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从文学、历史和政治三个层面对永贞革新与中唐文学进行综合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全新课题。正因如此,本课题在资料的搜集、事实的考察、文本的分析、理论的探讨诸方面,都具有相当的难度。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是在资料搜集与考订及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而进行理论探讨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界长期在资料建设与理论研究方面,往往有所偏重,存在歧见,甚至有宗派之争。本书有鉴于此,力图打通这种隔阂,从资料搜集、事实考订到文本分析和理论概括,使之彼此谐和,有机凝聚,作出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是初步的。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理论探讨,下编

是资料考订。两编相合,可以进一步了解永贞革新发生的前因后果、永贞革新本身的复杂过程、永贞革新等政治事件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这里,我将进一步扼要地说明贯穿于本书的几个主要论题及相关问题。

永贞革新与东南文士集团

永贞革新与东南文士集团的关系,是我在研究中提出的新的论题,而且不同程度地贯穿于全书之中。笔者认为,永贞革新启动于东南文士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崛起,打破了唐代建国以来200年间的以北人(关中士族与山东士族)为主体的统治格局,是南方寒俊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他们不仅以地域因缘聚合起来,而且以吴人陆质的《春秋》新学作为其政治革新的理论基础。这场斗争固然在宦官、藩帅与旧官僚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它却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代历史发展的走向。永贞革新对宋代的政治结构影响甚大,其影响及于王安石变法和清末康有为的戊戌维新。永贞革新的失败,与寒俊出身的东南文士集团的势力单薄有关。因为与王叔文集团对立的是宦官、藩帅、旧官僚和一部分文士等庞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几乎都不是南人。寒俊的南人执政,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北人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大大地触犯了门阀士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不可能甘心,因而群起而攻之。永贞革新的党派分野,从大的文化背景看,仍然是南人集团与北人之间的斗争。此外,在王叔文集团内部,也有派别斗争,他们在对待藩镇、是否立太子和对待反对派等问题上,立场均有所不同。因此,革新失败,与其内部分裂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叔文集团的骨干人物,从地域因缘上看,有三类:一是吴越文士。王叔文越州人,王伾富阳人,凌准富春人,陆质吴人。二是

其先世安史乱后避地吴越者。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先世都从北方迁居于吴，他们多在吴地长大。三是吴越之外的文士。总的来看，永贞革新集团以吴越文士为代表。他们不仅从事政治改革，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独特的造诣，以陆质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对韩泰、韩晔、柳宗元、凌准、吕温都有极大的影响，五人都是陆质的弟子。他们都是著名的文人，在贬谪之前，已有一定的文名，贬谪之后，刘、柳等人在文学上造诣更深。作为东南文士，他们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

这一论题主要以政治事件为中心，对中唐文学背景进行初步的考察。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这3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重要的有牛李党争与元和削藩等。有的为期甚短，有的延续较长，直至晚唐初期。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中唐后期的文学背景。永贞革新虽然在几个月后彻底失败，但以革新的精神改变了士人们长期苟安的心态，却远远超过了这一事件的本身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对中唐后期文学的进程具有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中唐前后期文学的界标。牛李党争与永贞革新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两个事件的党派分野，都与内廷宦官集团的分野密切相关，是内廷宦官与外朝士大夫相互勾结、为争权夺利而形成的不同集团。二是元和三年(808)对策之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与永贞革新集团具有一定的人事关系。三是牛僧孺等人在思想观点上与永贞革新集团颇有一致之处。因此可以说，中晚唐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即渊源于永贞革新，是宦官内部斗争和外朝士大夫斗争的继续。元和削藩与永贞革新的关系，历来罕有论及。这大概是史家记载把元和削藩都归功于宪宗造成的。本书则从史实入手，并分析中唐的政治局势，论证永贞革新与元和削藩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联系。甘露之变与永贞革新是唐代两次以反对宦官为主的斗争，又同归于失败，但其相异处不少：首先是时世不同，其次是结

果不同,再次是目的与过程不同。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甘露之变仅是一次极为冒险的宫廷事变,最后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其极为惨酷的结局,在人们的心灵上增添了一层暗灰色,以致于在此之后,全身远祸成为文人的普遍心态。

对中唐文学来说,影响文学最大的因素是政治事件。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中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成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

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但同样是刘禹锡,几年后经历了甘露之变,就由前此政治的失意,转为对政治的恐惧。经过了甘露之变,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映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中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以苦吟著称的贾岛,成为一大批诗人模仿与效法的对象,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永贞革新与元和新变

与元和文学相类的,文学史上有“三元”现象。“三元”即元嘉、元和、元祐。这三个时代,从政治环境看,都是以革新作为主要特征的;从文学情况看,都是非常繁荣的。以“三元”文学作参证,突出永贞革新是元和文学得以产生与繁荣的前提之一,是本段论述的重点。

元和文学之变,主要表现在元和体上。对于元和体的论述,学

术界分歧较大,本书通过从天宝到元和士风的变化,阐述元和体发生的渊源,并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元和体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内涵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分元、白之元和体与中唐之元和体两类。元和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不指元和时期的全部散文和诗歌,也不包括元、白的全部诗歌。元和体的特征是“怪”,也就是通变、变新。变新是元和诗坛的新气象,而永贞革新促使士风的变化,无疑是促使元和体产生的因素之一。唐人论元和体,也包含元和体的流弊。

永贞革新在客观上促进了南方文学的发展,也是元和文坛新气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唐代,南方,特别是湖南、岭南,本地籍的作家很少,比较著名的只有张九龄和李群玉二人。同时,岭南、湖南地区又是官员与士人贬谪流放之地,而以元和时期最为典型,因而元和时期的南方文学,实际上就是贬谪文学。刘禹锡、柳宗元贬谪到湖南、岭南,时间很长,都超过10年,文学成就也很高,他们的代表作品都产生于此。贬谪使刘、柳二人成就为文学大家。他们贬谪南荒,政务之余,流连于自然的山水美景,观察各地的生活习俗,创作了形象生动的表现民俗风情的诗篇,并把自己的情怀蕴涵于诗中,真挚感人。他们的贬谪,把北方光辉灿烂的文学带给了南州,南北文化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贬谪的元和时代,得到了有机的融合。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交谊、思想和文学

韩、柳、刘三人的关系,无论是政治上的攻讦、人事上的隔阂、思想上的差异、哲学上的辩驳,还是文学上的相互钦敬,其焦点主要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本书从韩愈的《永贞行》和《柳子厚墓志铭》等作品入手,对于三人之间交谊上的微妙关系和深沉内涵作了细致的研究。韩愈出身于北方的破落士族,但他自视出身高门,门阀观念使得他与出身寒俊的东南文士不屑合作。韩愈与宦官的关系密切,尤其拥护宦官头领俱文珍,而俱文珍又是刘、柳最

大的政敌之一。对待宦官的态度，促成了韩愈与刘禹锡、柳宗元极为明确的党派分野。

韩愈的政治立场，导致了他在撰写《顺宗实录》时史学观点的偏颇，使得这部实录并非信史。原因之一是韩愈是站在俱文珍为首的宦官立场上写这部书的；原因之二是该书成于宪宗朝，而宪宗是镇压永贞革新而登上皇位的，这时所修的《顺宗实录》，不易对顺宗朝的史事作出公正的评价；原因之三是宪宗以后各朝，多加修改，以致面目全非。《顺宗实录》的不实，给永贞革新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

古今学者，都有人根据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视韩、柳为知交。本书对《柳子厚墓志铭》深入研讨，参以三人的立身行事，认为墓志铭主要写政事、友情、文学三个方面。韩愈以柳宗元为司马、刺史时的所为与永贞革新中的行径相比，又以文学与政事相比，都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说明他对柳宗元的主体精神缺乏了解，更体现了二人对永贞革新这一政治事件的巨大分歧。

韩、柳、刘的学术论争表现在两个方面，观点截然相反。一是哲学论争，焦点在天人关系上。韩为一方，刘、柳为一方。韩的观点是天命观，故受到刘、柳的抨击。柳最富有战斗性，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但所论未能“究天人之际”。故刘禹锡发展了柳的论点，提出“天与人交相胜”之说，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他的客观规律，并不是天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二是史学论争。韩愈认为“为史者，不有人祸，即有天刑”，说明他没有真实反映历史真相的勇气；柳宗元则明确表示“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与永贞革新时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精神一致。二人的人格与精神不啻天壤之别。

史料问题

研究永贞革新乃至顺宗一朝的事件，史料问题最为棘手。有关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极少，许多材料被故意毁弃，伪造与篡改的地方也很多，几乎每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永贞革新集团

的语气,后代大多数历史学者也都根据当时不真实的史料,人云亦云地认为他们是小人。唐以后有关顺宗朝的史事记载,主要是依据《顺宗实录》,诸多问题忽明忽暗,宫廷不少隐秘不易解开。即使刘、柳等人,贬谪以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对顺宗朝事,也讳莫如深。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多方采撷以作补救,尤其通过永贞革新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的作品,联系当时的实际背景,进行排比参证,综合分析。对于现存的史料,研究时也略去谤词,专看其史实,抑或可以得出逐渐接近事实的结论。这就是本书的下编专门考订史实的原因。下编以王叔文集团为中心,对有关永贞革新的诗文作较为详尽的编年,并考证永贞革新主要人物的事迹,借以从多层面、多角度探讨永贞革新与中唐文学的关系及中唐文学发展兴盛的前因后果。